



「文明的互鉴：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分论坛上，多国学者热烈讨论

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中华文明

“冷战时期美国式的中国研究把中国作为全球战略博弈中的一个行为体来分析，当把研究对象作为分析单位时，难免出现中心和边缘的视角，这种视角在过去对理解中国带来很多误区。今天的中国学应该跳出这个视角，今天，中心的特质不断变得稀薄，边缘的异质性特质在不断凸显，历史上，往往在边缘的地方会产生一些创新性的发展。”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努力建设促进对话交流的机制，并将其推广为全球共享的机制。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未来的世界是可期的，中国对未来的贡献也是可期的。”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世界汉学中心教授)

■本报记者 任思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探讨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是当下令人振奋的议题。昨天，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文明的互鉴：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分论坛上，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嘉宾从多个角度各抒己见。

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性

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国际学者都认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对其现代性关注不够。这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对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大感受。由此，他专门围绕“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展开主旨讨论。

张维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行为体的结合。中国首先是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它数千年未中断的古老、独特的文明，使之与众不同。”

今天的中国既古老又年轻，这两者相得益彰，体现于中国古老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各个方面。比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上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汉书》，正是对于实事求是的推崇，使中国的发展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实现了中国的全方位崛起；比如，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共建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共同富裕等理念，都有天下为公等传统思想的影子。这些中华文明中从古至今传承的价值追求，代表了人间正道，不但在中国深得人心，也日益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

在人类文明视野中重塑中国学研究

中西文明相遇是世界历史大事件，彼此能否共处，关乎人类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费从中西文明对历史本身及其意义的不同看法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异。

西方以基督教神学为背景发展出一套历史哲学，其核心是以普遍历史的观念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但基督教视角下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形成了一种单一线性的普遍历史意识。这一点在经过启蒙运动转化之后，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论与历史进步论，它支持了文明等级论，以及以

此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支配世界的霸权。相较而言，中国的开放历史意识是更具未来意义的历史观。陈费认为：“中国思想对历史意义的思考走向了人类各大文明在多元共生前提下建构历史意义之网，每个文明在这个意义之网中都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对当下中国学的理解。过去所谓的中国学有两个参照物，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汉学，源于对中国的兴趣；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冷战时期中国研究，是当时国际战略研究的产物。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学已经超越了这两个阶段。”

多年来，中国学被认为是“外国人眼里看到的中国”，像一面镜子，帮助中国人看到“他者眼中的自己”。范勇鹏认为，这样的视角既会带来惊喜，也会造成扭曲，当下中国研究应该更多地站在主体的位置上进行。此外，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等，都应被平等地放置于人类文明的视野中审视，以此超越过去中国学研究中简单的“中心-边缘”视角。

在中国和世界的双向奔赴中推进对话交流

今年7月，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10月，世界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大会在青岛举行；11月初，世界汉学家大会在苏州举行；昨天，上海浦东又迎来了世界中国学大会。“我愿意把2023年称为世界汉学年。”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世界汉学中心教授徐宝锋这样感慨。

徐宝锋认为，今天全球已经进入中国知识爆炸的时代，外国友人对中国的关注，已经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当下、道路、制度等多个方面。

徐宝锋进一步强调，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才能推动对话和交流，才能消除隔阂，达成共识，形成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发展，建设对话交流的机制，并将其推广为全球共享的机制。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等，搭建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也是本场分论坛的聚焦话题之一。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原所长东乡和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充满研究兴趣。他说：“今年10月中国刚刚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显而易见，通过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很大发展。”他同时认为，如果日本不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从更宏阔的角度理解和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利于双方增进了解和交流。



“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龙摄

■本报记者 李纯一

百多年来，建设学术、扭转国运，为新一代学人的信仰。域外中国学的知识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迅速累积，历经一个世纪之后，早已内化于我们自身。

在“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上，国际传播、语言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中外学者，交流了长时段视角下中国各门学术的变革，来自图书馆与中国学研究刊物的两位学者的谈话更是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学文献见证了百十年学术发展史

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陈樱感叹国图馆藏中国学文献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及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百十年学术发展史的缩影。

陈樱介绍，中国学文献成为国图的特色馆藏，与老馆长袁同礼先生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1931年，袁同礼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提出：“外国文书方面，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杂志，力求全份；古今名著积极搜罗，而于所谓东方书籍之探求，尤为不遗余力，以为言边防、治国闻、留心学术者之览观焉。”这是晚清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之下，对域外知识的密切关注，也是有感于社会巨大变革、故家藏书四散，形成的学术救国情怀在图书馆的一种回应。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国家图书馆对中国学文献的采访。

近百年后的今天，国图馆藏中国学图书语种涉及近百个，数量达15万种，拥有200余种连续性专题期刊，已成为目前国内中国学文献最大的收藏地。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名几经更迭。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每年都编纂有大量的中国研究相关外文书目；1957年，编纂两卷本馆藏西文中国问题目录(时称北京图书馆)；1989年设立中国学文献研究室，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建立中国学研究收藏和研究的机构之一；2009年，国图成立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国图对中国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揭示，为学术界与决策机构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参考。

国图收藏的第一部中国学著作，是1911年受赠的法国汉学家沙畹与列维的著作。由此，国图渐成海外汉学家交流的高地。劳费尔、伯希和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通讯员，费正清、戴乃迭曾任国图《图书季刊》的英文编辑，顾立雅、李约瑟等学者利用馆藏文献收获早

期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由任继愈馆长主编的《国际汉学》创刊于国家图书馆，陈樱说，这本刊物现在随着张西平先生的工作调动，转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汉学》杂志：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知识具有了世界知识的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说，世界中国学或海外汉学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以后，逐渐不再再以经史子集来表达自己的知识和传统。“汉学是以西学的形态进入中国近代的学术变革中，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如敦煌学，包括高本汉的语言研究，最早都是‘他者’研究中国的学问，但却深深内刻于我们自身的学术形成过程中，因此对它的认识就成了我们自己学问的一部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中国学的介入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张西平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在传统的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之外，海外学者夏志清笔下的现代文学史，则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是完全另一个传统。“如果你只看他们，不会知道《小二黑结婚》和《子夜》，但如果你只知道‘鲁郭茅巴老曹’，你就不知道中国文学还有另一个审美的叙事。”更有意味的是，如何结合这两种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也尚未有很好的叙述，因此可以说，海外中国学的视野挑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

从晚明以后，关于中国的知识、思想的表达，开始具有了世界性。中国知识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东亚一隅，而在全世界展开。因此，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知识的世界化，标志着它具有了世界知识的意义。”但是，中国学术界怎么消化这一份来自域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把它纳入到一个内外兼容合并的知识体系中，仍是一项存在挑战的事业。张西平表示，在世界不同文明和学术体系中展开海外中国史的研究十分必要，需要建立一种对话的、批评的中国学。“我们希望更多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成为融通中外的学者，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研究中，听到更多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学者如何在吸收域外中国学的同时，重新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表达，与各国汉学家展开讨论十分重要。”

“中国学术界如果要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就必须以全球史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自己的知识和中国文化的叙述，吸收其所长，批评其不足，使中国的知识真正世界化，这就是世界中国学的重要意义。”张西平说。

“当前构建中国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时代课题并取得积极进展。长期以来，中国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处于‘他塑’的状态。随着‘东升西降’国际态势的逐步形成，中国形象的传播应该‘自塑’与‘他塑’相结合，注重话语创新。”

——刘刚(新华社研究院院长)

汉语文化亟需启用新的范畴观。新的范畴观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学争议，从而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其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理念，强调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包含关系为常态。如天人合一、体用不二、有生于无、物犹事也，都是这种包含观的体现。

——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文明的互鉴：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上，学者们深入对话

使中国知识真正世界化，是中国学的重要意义